

# 移动的边塞诗

——以唐王朝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中心

张同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20)

**摘要:**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都存在着一个因边塞的位移而影响边塞诗情志的问题。文章以唐代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认为有唐一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与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同步。大致看来,初唐边塞诗由于朝廷开疆拓土并实行羁縻州府制度,从而使得当时疆域虽然最为广袤但并未体现在边塞诗上;盛唐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相比领土大为缩小,但由于西域实行都护府管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游边入幕乃至参政,于是形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兴盛及其风神、气骨;安史之乱,导致大唐疆域的中原化和边塞的内移,从而直接造成了中晚唐边塞诗萧瑟哀怨的风格。

**关键词:**边塞;位移;边塞诗;情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4)01-0018-08

## On the Moving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Centering around the Tang Fortress and its Poems

ZHANG Tong-s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the sentiments of the poets in every Chinese dynasty were affected by the moving of the frontier fortress. An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ang Fortress and its poems as an exampl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emotional change of the poe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ving of Tang frontier, but they did not synchroniz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arly Tang,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System of Autonomous Region; therefore, the enlargement of the territory was not written in the poems. In the high Tang, the territory had shrunk compared to the early Tang, but the western region was in the government's direct charge and some intellectuals went there as the managers; therefore the fortress poems flourished. After the An-shih's Rebellion, with the inward moving of the frontier, the poems became bleak and sa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Key words:** the frontier; moving; the fortress poems; the sentiment

收稿日期:2013-11-06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3LZUJBWZY016)

作者简介:张同胜,男,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边塞诗尤其是唐代边塞诗的研究,迄今为止可谓是蔚为大观,卓然成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似乎皆已穷尽,很难再有新的突破。粗略数来,边塞诗的论文迄今已有一万一千多篇了,但大多仅停留在具体的就诗论诗的层面上,主要是探讨边塞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或诗人风格之比较等,重复或雷同的论述动辄以十数篇甚至数十篇计。其实,新的透视或许能够提供新的观照视域,如从宏观上扫描一个王朝边塞的位移及其与边塞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尚未引起学人的注意,因而有对此进行探讨的必要。

历朝历代边塞诗,大都存在着一个因朝廷边塞位移变动而变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诗人的“志”与“情”,从而形成了一个朝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史。兹不揣浅陋,试以唐代的边塞位移与边塞诗为例简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 一、何谓边塞诗

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边塞派”诗歌概念,但孟二冬质疑“盛唐边塞诗派”这一称谓,认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sup>[1]</sup>。那么,何谓边塞诗?学者对“边塞诗”的理解和界定至今依然莫衷一是。例如,边塞诗是否仅限于唐代?有一些诗人从未到过边塞,但假借着边塞的名义虚构想象以大发其牢骚的诗篇究竟是不是边塞诗?边塞诗就是“征战文学”<sup>[2]</sup>或“战争文学”<sup>[3]</sup>吗?胡大浚认为从内容上来看,全部近2000首边塞诗虽然围绕边战而发,但是绝非战争所能涵盖<sup>[4]36-39</sup>。即这个界定显然过于偏颇,因为还有描述边塞风光而与战争无关的诗篇。

目前,边塞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边塞诗“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秦长城西起临洮、经兰州,其实也可包括河、陇)。以作者而言,要有边塞生活的亲身经验”<sup>[5]</sup>。广义的“边塞诗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因此边塞要有‘史的规定性’;但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而不排斥其它朝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边塞诗有题材内容的规定性,即与边塞生活相关,又有大量不直接写战争的抒情诗、咏物诗、山水诗、朋友赠答、夫妇情爱之类的作品”<sup>[4]36-39</sup>。还有一种更为广义的说法,阎福玲认为,“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sup>[6]</sup>。

本文基本认同上引广义的边塞诗,即它指的是与一个王朝边塞相关的抒情或叙事的诗篇。民族国家是一个近代晚出的概念,因此我们以大一统的王朝作为透视点,即四分五裂的诸侯国之间的边塞及其诗歌似乎不应称之为边塞诗,边塞诗指的是大一统王朝边疆设防之处的歌咏吟唱。因而边塞之于边塞诗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即如果没有边塞,谈何边塞诗?但边塞不是边疆。由于历朝历代的边疆并不相同,甚至同一王朝的边疆也处于变动、变迁或变更之中,因而边塞诗的心灵史之于这个王朝也是一直在演变之中。

唐代边塞诗是《全唐诗》中的重镇,一说有一千多首,另有统计为两千多首<sup>[7]</sup>。对唐代边塞诗的阅读,诚有精深之作,但大多数则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或是不区分时间前后的主观臆断,或是没有具体地理意识的想当然,如此种种,皆是隔靴搔痒。即以宏观来看,大唐王朝边疆线变动不居,因而相关的边塞也多有位移,并直接影响到诗人或昂扬或低沉的情绪,从而唐代边塞诗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历程中有一个演变的线索和何以如此演变的缘由。

## 二、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问题

诚如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唐代疆域前后盛衰变动极剧,大体言之,可分四期:(一)极盛期,唐初太宗高宗时代。(二)定型期,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三)渐衰期,安史之乱后之中唐时代。(四)式微期,晚唐时代。”<sup>[8]1405</sup>从严耕望先生所绘制的“唐代疆域政区交通都市图”来看,唐代疆域线变迁之大,超出想象之外。初唐指的是从李渊武德至李隆基开元初这段时间,除了武德时期,就是大唐疆域的“极盛期”。到了盛唐,疆域缩小了一半左右;到了中唐,疆域又缩小了一半左右。粗略一观,大唐边塞位移

变动之巨,实在惊人。

### (一) 极盛期

隋末,李渊父子为了入关曾向突厥称臣。经过与群雄的争霸和兼并,终于取杨隋而代之。此时的疆域似乎尚不如隋大业年间。武德六年(623),颉利可汗率领十五万大军自雁门攻入并州,又分兵进扰汾州、潞州等,掳走中原百姓五千多人,从而可推知当时的边塞之大致位置。武德九年,颉利可汗率兵至武功,兵临渭水。李白《塞上曲》诗云:“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这首诗以汉喻唐,记述了唐初朝廷的屈辱史。

李世民登基后,以雪辱为志,派大军攻打突厥。贞观三年(629),李靖、李世勣等率兵十万出击东突厥。贞观四年初,生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贞观九年(635),征服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西域其它城邦也降服,设立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贞观二十一年(647),设立燕然都护府。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唐遣程知节率领大军西击沙钵罗可汗。显庆二年(657),苏定方带兵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被擒,西突厥亡国。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龙朔二年(662),破铁勒。龙朔三年(663),刘仁轨带兵大败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麟德二年(665),撤回葱岭。乾封元年(666),李世勣率领大军东征高句丽。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灭高句丽。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三十二年。

唐总章三年(咸亨元年,670),唐高宗命薛仁贵率十万大军攻击吐蕃,在大非川全军覆没。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迫使唐王朝撤销安西四镇。咸亨三年(672),从百济撤军。仪凤四年(679),突厥再起。

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又恢复了安西四镇。之后,狄仁杰与崔融就是否放弃镇守四镇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辩论,最后武则天接受了崔融的建议,恢复了安西四镇。

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族李尽忠率众造反,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镇压,结果失败。此后,长安三年(703),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断绝。唐太宗、唐高宗时,在北方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河北蔚县)和定州(河北定县),迫使唐王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 (二) 定型期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3-756)是唐王朝疆域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与极盛期相比,疆域已经大为缩小。《旧唐书》所谓“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sup>[9]1393</sup>,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规定,因为大唐疆域变动实在是太大,即使是我们划分为初、盛、中、晚唐四段,在具体的某一段历史时期边境领土都有反复。譬如,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壤北移至新城,后又内移至平州、营州,以至于青州而废止。

即使是在定型期,大唐的边塞有的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如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攻破石堡城;天宝八载(749),哥舒翰带兵攻破石堡城;安史之乱起,石堡城又陷入吐蕃。再如开元初,九曲地作为金城公主的嫁妆送给了吐蕃;天宝十二载,收复九曲地。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sup>[9]1387</sup>这是东北边境及其要塞。

沈文凡、彭飞《隋唐东北边塞诗创作述论》将隋唐时期东北疆域范围认定为“今天的东三省与河北省的东北部以及京津地区”<sup>[10]</sup>,因而大唐东北边界就很清楚了。以边塞“营州”治所即今辽宁朝阳、唐

末被契丹占领,后置营州于广宁(河北昌黎),五代后唐时又被契丹攻占的史实来看就清楚唐王朝东北边界的变化情况。

### (三) 渐衰期

渐衰期即中唐,大致指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唐穆宗长庆四年之间(756-824)。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将驻防西域的军队内调平叛,吐蕃乘机攻取了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天成等军,攻占了石堡城和百谷城等。宝应元年(762),吐蕃再陷秦州、渭州等。次年秋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sup>[9]273</sup>,整个西北边陲尽失。十月陷长安。建中二年(781),沙州(今敦煌)失陷。贞元三年(787),北庭、安西相继陷于吐蕃。

于是,大唐边界线大幅度内移,边防线收缩到长城一线,边塞主要有凤翔、泾州、原州、灵州、丰州、胜州以及黄河北岸地区。中晚唐,吐蕃、回鹘、南诏等外侵,朱希彩、朱泚、李怀光、李希烈等内乱,十五道藩镇割据,朝廷实际统辖的疆域越来越狭小,权势也越来越衰微。

### (四) 式微期

式微期即晚唐,大致指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之间(825-907)。

据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大唐式微期南诏“尽取大渡河与戎泸以南之地,于是今贵州全省与广西西半部皆失。及黄巢之乱,安南亦失,河西亦为回鹘所据,迄于唐亡”<sup>[8]1410</sup>。由此看来,如果再除去人事权、财政权等皆独立的藩镇(据《新唐书·藩镇传序》可知,割据的藩镇“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大唐疆域是何等促狭,而其边塞变化又是何等之大!

## 三、边塞位移与边塞诗创作是否同时

诗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其具体时间与历史上的“四唐”划分时间又不完全一致。这种划分,从某个角度来看或许有其道理。但具体到边塞诗,情况就不一样了。边塞诗的创作与边塞的变动有相符合的,也有不相一致的。

边塞的变更,首先是军事战争的事情。唐代中国与印度等有口述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同,并没有随军的歌吟艺人,因而战争的事迹不能近乎即时地传播开来。第二,边塞似乎不宜与边界混同。初唐时,疆域最为广袤,然而由于当时对新开拓的疆域大多实行的是羁縻州府制度,即委任土著酋长进行独立性的管理,并不派遣官吏,因而边功没有反映在边塞诗中。第三,唐高宗时,开始委派官吏前去西域进行管理或“治理”,但大多不过是“点”与“线”的治理:点即都护府,线即驿道或域内的丝绸之路。第四,到了唐玄宗时期,武将拓边,文人入幕乃至参与边政,因而文官甚至武将多有边塞的吟咏;风气所尚,使得即使没有去过边塞的诗人也时有撰述,于是在玄宗朝边塞诗蔚为大观。

由此可知,初唐的羁縻州府制度与境内的文人士大夫关系不大,在军事征伐过程中,文人参与的又不多,因而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是大唐军事力量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但边塞诗却兴盛于唐玄宗时期。

正是由于大唐王朝边疆的变化巨大、边塞的位移明显,因而在我们解读具体某一首边塞诗的时候,应该具有明确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

盛唐时,疆域北抵黄河北之三受降城,但诗人李颀、李白笔下的边塞却依然是雁门、太原等地。李白的《太原早秋》写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李颀生活于开元、天宝年间,从而可知唐代边塞诗中除了借代之虚写外,边疆上的真正边塞与唐人当时的边塞感知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据王永莉的考察,“唐人心目中的‘塞’,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sup>[11]</sup>。由此看来,唐人意识中的边塞与唐王朝实际的边塞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王永莉的说法

恐怕也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因为近三百年间人们对边塞的意识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千帆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认为不宜将边塞诗中的历史方位、距离等过于坐实<sup>[12]</sup>。这是很有卓见的,因为边塞诗毕竟是文学,不是历史,因而其真实性只能是心灵史的真实,而不可能完全是纪实。

## 四、移动的边塞诗

有唐一代,边塞诗特点主要有三:一是“边塞诗的数量空前剧增”,二是“创作群体庞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成为主体”,三是“雄视千古的高度成就”<sup>[13]279-281</sup>。学者注意到了初唐边塞诗的“郁愤”;盛唐时期边塞诗空前繁荣,以“豪雄”著称;以及中晚唐边塞诗一片“衰飒”或“萧飒”;甚至到了晚唐边塞诗为“反战哀歌”<sup>[14]</sup>,但对于其风格的演变与边塞位移之间的关系,似乎留意不多。

### (一) 初唐时期的边塞诗

初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有李世民、虞世南、魏徵、李峤、崔融、崔湜、苏颋、张说、张九龄等,一般说来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具有台阁气,犹“存六季之遗音”<sup>[15]</sup>。如前所述,唐太宗贞观四年,李靖、李世勣率兵在定襄、铁山大败东突厥,擒获颉利可汗。“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sup>[9]39</sup>。就在此时,唐太宗撰写《饮马长城窟行》,但其中的交河、瀚海、阴山、长城、龙堆、马邑等是否就是发生战事的地方,还是泛指边塞?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作边塞诗《执契静三边》以记之。历史现象或文学现象,一旦概括就容易抹杀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初唐边塞诗特征的概述也是如此,因为初唐四杰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知识分子的边塞诗与前述说法迥异,即宫体诗在卢照邻、骆宾王手里是“由宫廷走到了市井”,五律则在王勃、杨炯的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sup>[16]</sup>。窦威、孔绍安、王宏、宋之问、辛常伯、张敬忠、徐彦伯、刘希夷、张柬之、郑愔、徐坚、张嘉贞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边塞诗,也各具特色,难以“台阁气”概而论之。

下面我们从初唐诗人边塞诗中的地名大略看一下当时的边塞情况。在骆宾王的诗篇中出现了:皋兰、兰山、积石、陇坂、天山、崆峒、阳关、玉门关、贺延碛、流沙、轮台、疏勒、蒲类津、交河、弱水、龙鳞水、马首山、密须、温城、碎叶等地名。卢照邻诗歌中的汾川曲、乔知之笔下的雁关、李峤诗中的西蕃、崔融诗句中的安西、幽、蓟等地都表明在他们心目中的边塞与大唐新开拓的边疆上的边塞还没有完全吻合起来,或许这是由于军事战争仅仅主要是君主和将领关注的事情,而文人士大夫没有亲身经历从而无从将那一段辉煌的历史以及豪迈的精神浓墨重彩一番。

### (二)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

“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sup>[17]849</sup>,边帅可以入相,文人亦可以建功立业,“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躐级进身”<sup>[18]</sup>,甚至有如封常清以谦人、判官身份而出任节度使的,因而此时边塞诗大为兴盛。

盛唐边塞诗之特点,正如胡应麟所言,以风神、气骨胜:“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sup>[19]</sup>

王昌龄诗篇中的井陉、榆关、洮河等,高适笔下的蓟北、营州、河洲、临洮、燕支、青海等,崔颢诗句中的燕代、西河、辽水、渔阳等,李颀所谓的幽燕、白山、交河等,王维边塞诗中的贺兰山、凉州、居延、燕然、阳关等,大多所体现的还是唐人传统意识中的边塞观。

而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剑河”,即今俄罗斯斯叶尼塞河;常建《塞下曲》中的“北海”指的是俄罗斯贝加尔湖;王维《使至塞上》中的“燕然山”和郭震《塞上》中的“金微”今皆在蒙古境内:史诗互证在这里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边塞诗展现了大唐疆域的新气象。随着盛唐疆域的开拓,大唐的边塞有了陌生的面孔,边塞诗从而也具有了新的精神。边塞诗的图景有助于我们想象盛唐疆域的辽阔和变动,勾勒出所谓的盛唐气象,但从中也能体味若干盛衰沉浮的苍凉。

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在李唐时期,“西域”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唐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的地区;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占高昌后,西域指的是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直至晚唐,西域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sup>[20]</sup>该文给人启发颇多,我们从“西域”一地之位移,可以想见大唐疆域的变迁;但文中主要论述的是初盛唐时期西域概念的西移,问题是中晚唐时期,西域依然是“帕米尔以西的地区”吗?

中晚唐的“西域”观姑且不谈,我们先结合着上述“西域”概念观谈谈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两首诗歌中的“西征”读者颇有争议,根据“西域”概念的具体所指位移的事实,就能较好地解决盛唐时期岑参西域军旅诗中“西征”的本事问题。

盛唐边塞诗,自成诗国,城邦林立,各具特点。而其中最具有史诗纪实边疆史特点的,当属岑参的边塞诗。岑参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主要有:北庭、苜蓿峰、葫芦河、陇山、临洮、铁关、玉关、渭水、碛西头、热海、轮台、走马川、酒泉、凉州、玉门关、交河、碎叶河、银山、焉耆、铁门关、安西、火山(火焰山)、海西头、金山西等,这些地方大体勾勒出了盛唐时期西北边塞的位移。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云“一身从远使,万里赴安西”、《送费子归武昌》诗云“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过碛》“行到安西更向西”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朝廷开边拓疆的作为。

### (三) 中晚唐的边塞诗

《新唐书》云,与大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因此边塞诗便主要集中在边境冲突的要塞之地。但问题又颇为复杂,如“边塞诗产生的地域,虽以西北为重心,但在西南边疆,也有数量可观的诗篇。边塞诗产生的时代虽以盛唐为著,但唐代中后期仍在继续发展,且不乏精彩之作”<sup>[21]</sup>,这诚然不错,但不很全面,因为只要有边事的地方,就有边塞诗,如东北边界,战事此起彼伏,从而边塞诗也不能忽视东北边疆。

中晚唐边塞诗人主要有刘长卿、耿漳、戎昱、卢纶、戴叔伦、李益、王建、张籍、姚合、薛逢、项斯、马戴、李频、曹邺、高骈、雍陶、许棠、曹松、李涉、朱庆馀等。他们当中固然有诸如李益、卢纶等尚带有盛唐遗音的诗人,但绝大多数“抒写边塞战争的负面影响和戍边者的负面情绪”<sup>[13]436</sup>。

显而易见的是,从如李益边塞诗中的地名渭北、戎昱诗句中的黄河、襄阳、泾州、并州等很明显地感到中晚唐边塞的变易是何其之大,而内中的情绪又是与盛唐何等迥异!再如,顾非熊《出塞即事二首(其二)》诗云:“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贞元七年(791),河湟之地尽陷于吐蕃。贞元九年,筑盐州城,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诗中有所反映。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只得仓皇出逃,后吐蕃退出长安。但凤翔以西、汾州以北均为吐蕃所侵占。李绹《陈时务疏》云:“近以泾、陇、灵、宁等州为界。”白居易《西凉伎》诗云:“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贯休《边上作》诗云“山无绿兮水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张籍《陇头》“陇头已断人不行”、崔国辅《从军行》诗云“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等等,都体现了中晚唐时期大唐边界的内缩和边塞的位移及其变化,但是,由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情感性,这一历史时期中的边塞诗,充其量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心灵史,而不能完全将它们作为史实来看待。

陈陶《陇西行》诗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般说来,我们只是分析此类边塞诗的闺怨、忠国或惨烈,如果没有史实作支撑,难以深入到诗歌的精髓之处,但事实上文学的特性、借代的运用和心灵史的写意等都难以使我们做纯粹历史的考索和解读。

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在边塞位移上留下了自己的或浓或淡的踪迹。吐蕃攻占沙州(今敦煌)时,陷落吐蕃的唐人的边塞诗记载了时空的沧桑。据“敦煌唐人诗集卷残”伯2555号文献,载有至德三年至建中二年两位唐人的边塞诗共七十二首,其中佚名作者五十九首,马云奇十三首<sup>[22]</sup>。这些诗歌记录了落蕃人关于边疆的风物描写、人生遭遇和思想情感。

一般说来,盛唐边塞诗的特点后人将之归纳为境界阔大、气势雄浑和格调昂扬,而中晚唐边塞诗则境界狭小、格局卑弱、衰瑟冷寂,这显然与军力不振、国势衰微、边塞内移等密切相关。

## 五、体验还是想象

李唐近三百年,后人动辄就是大唐如何的强盛,其实除去藩镇割据的一百五十二年、初唐恢复国力的武德时期,李唐真正强大兴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这近三百年中,李唐王朝的边塞几经变迁,因而唐代边塞诗的解读就不能不把握边塞诗形成的时空问题。

这个问题细致说来,还涉及到诗人是否到过边塞。据一种统计,李唐共有两千二百多诗人写过边塞诗,但这些诗人中大部分并没有去过边塞,因而他们的边塞诗便是想象力的产物。而到过边塞的诗人,他们所写的边塞诗是亲身经验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边塞诗可分为想象的边塞诗和体验的边塞诗。

这个角度便可以解释王之涣《凉州词(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直上白云间”的问题了。王之涣即使出过塞,也不过是去了东北边境,可以肯定他没有去过西北边塞,因而这首诗便是他想象的产物。既然它纯粹是想象的产物,落实地理、气候的问题也就是另一回事了。李唐一朝,没有到过边塞而撰写边塞诗的诗人不在少数,再如据《旧唐书·文苑传》可知贺朝一生未曾出过关,但其《从军行》却写了边地的艰苦和激战,这是边塞诗中的一类,即想象之作。其他如白居易、李贺等都没有到过边塞,但都写过边塞诗。中唐时期,边塞诗的作者大多生活在藩镇幕府之中,而到边地入幕府的则极少,因此他们的边塞诗大多是抒发情志的想象篇什而已。

谈边塞诗,不能忽视虚写与实写的问题。在唐代边塞诗中,有借代、夸张和意象等文学笔法,也有依据耳闻的符号或事件进行概念化创作的,如以汉喻唐、以匈奴代指突厥等。以汉喻唐的现象,在唐代边塞诗中颇为突出。这种借代,似乎有助于汉民族意识的形成及加强,从而使得民族融合之后生成一种共同体的认同感。当然,它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或者说是链条中的一链,但其作用和贡献却不容忽视。此类诗句,如“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胡笳折杨柳,汉使采燕支”、“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胡兵屡攻战,汉使绝和亲”、“天子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汉郡接胡庭,幽并对烽垒”、“汉掖通沙塞,边兵护草腓”、“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比比皆是。

读唐代边塞诗,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作者大多是写意而非纪实,假借汉事以寄寓自己当下的情志。因而诗篇中的边塞地名,不过是当时边塞的符号而已,诗人似乎不求也许不知边塞的具体精确的地理位置。“诗言志”,此一传统,源远流长。

## 六、从边塞诗看民族性

从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看出它的国民性。中国边塞诗中的寒苦、哀怨、愁绝之情绪与《伊利亚特》对外征服将士的心情进行对比,不同的民族性昭然若揭。

大唐疆域几经变更,边塞也几经变迁,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远近,只要是离开家乡,就哭哭啼啼、凄凄惨惨戚戚,如“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sup>[17]855</sup>。在中国的边塞诗中,“泪”、“哭”、“啼”、“泣”、“伤心”、“悲号”、“惆怅”、“愁”、“恨”、“怨”、“哀”、“断肠”等词语触目皆是,使用频率极高,从而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反映或体现了人民厌战、反战、爱好和平的情绪;如果对照其他民族对于战争的态度来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些哀怨之诗,由于其情真意切从而被视作“好诗”。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古代中国人,将背井离乡看作是大不幸,因而乡梓似乎就是天堂。但又不尽然,从诗篇来看,如果有名酒美女相伴,便不再害乡愁。那么,这就是说,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是

现世的安逸和享乐。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离乡便已悲戚;如果远征戍守,就更是肠断欲绝了。

杜甫《兵车行》诗云“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诸如此类的边塞诗,真实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还有读者注意到了边塞诗中的“无助、无能和无奈”的“三无”心态<sup>[23]</sup>。中国的边塞诗似乎根本就不是什么“青春之歌”、“黄钟大吕”,而是大多充满了哀怨、怅恨和哭泣。更有甚者,许多文人喜欢代闺妇怨望、以怨妇或弃妇自比等,这一点在边塞诗中也有所反映,从而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国民性。

以唐代边塞诗而言,初盛唐边塞诗中也能听到哭声,而中晚唐边塞诗对于边政、边战的反感指责、厌战思归乃至咒骂,其实倒是更真实地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性格。

## 七、结 语

有唐一代,边塞诗的风格流变与大唐王朝开疆拓土、边患战争以及边塞位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大唐边塞的位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诗人的情志,从而形成了唐代边塞诗演变的心灵史。

学人探析唐代边塞诗何以兴盛的原因,大多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其实,大唐边疆的开拓、边塞的位移与文人墨客的吟咏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唐代边塞诗之兴盛,显然与大唐帝国的开边和边塞的外移密切相关;而其衰飒,也与唐王朝疆域的内缩和边塞的内移联系紧密。

### 参考文献:

- [1]孟二冬.盛唐边塞诗派质疑[J].烟台大学学报,1988(3):32-35.
- [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41.
- [3]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35.
- [4]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M]//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
- [5]谭优学.边塞诗泛论[M]//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2.
- [6]阎福玲.边塞诗及其特质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1):98-102.
- [7]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0(3):88-92.
- [8]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M]//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9.
- [9]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沈文凡,彭飞.隋唐东北边塞诗创作述论[J].吉林大学学报,2011(4):57-62.
- [11]王永莉.基于边塞诗的唐人边塞感知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9(3):161-164.
- [12]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M]//张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95-119.
- [13]余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从先秦到隋唐[D].成都:四川大学文学院,2005.
- [14]胡大浚.贯休的边塞诗作与晚唐边塞诗[J].河西学院学报,2007(6):1-7.
- [15]叶燮.唐诗百名家全集序[M]//席启寓,辑.唐诗百名家全集.扫叶山房石印本,1920:3.
- [16]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
- [17]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18]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85.
- [19]胡应麟.诗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5.
- [20]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界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2012(4):113-119.
- [21]余嘉华.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J].云南社会科学,1984(6):70-82.
- [22]柴剑虹.敦煌唐人诗集卷残(伯2555)初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2):71-77.
- [23]刘世明.边塞诗中的三无心态[J].北方文学,2012(3):38-39.